



《群玉山头》经典成因探微

胡筱颖 韩倩

摘要:宾纳与江亢虎合译的《群玉山头》兼具普及性与学术性的特点。对译者背景及翻译目的、译文诗作编排、译本副文本研究,以及《唐诗三百首》六个英文全译本的语言分析显示:归功于译者的客观冷静和清晰的翻译目的,《群玉山头》以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为出发点、高度简洁、无重大疏漏,因而在众多《唐诗三百首》译本中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译本。

关键词:《唐诗三百首》;《群玉山头》;宾纳;江亢虎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5.023

收稿日期: 2020-09-20

作者简介:胡筱颖,女,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及实践与外语教学研究,E-mail: huxiaoying@suibe.edu.cn;

韩倩,女,四川通江人,文学硕士,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学校中学一级教师。

一 引言

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选本,深受国人喜爱。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成书以来,距今已有250余年,在这期间,除孙洙原刻本外,还有各种注疏本、续编本、补注本等陆续出现,版本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唐诗三百首》至今各种版本多达160余种。

现有在英语世界发行的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英文全译本共六种,译本呈现形式包涵了传统的纸媒形式(即书籍)、大学官网媒体(即国外大学网站上的电子版本)以及当今流行的网络媒体(即公共网站上出现的电子译本)。即:以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餐花阁版(1856年)为底本的《群玉山头》^①,以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为底本的《唐诗三百首》^②、《唐诗三百首新译》^③,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的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为底本的《唐诗三百首》^④,以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出版的邱燮友《唐诗三百首新译》为底本的《唐诗三百首》^⑤,以及以2010年台北三民书局刊行邱燮友编《新译唐诗三百首》为底本的《英译唐诗三百首》^⑥。

以上六个译本涉及的《唐诗三百首》中文母本共有四种,即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餐花阁版、陈婉俊

① Witter Bynner, Kang-hu Kiang, *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6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9).

② Innes Herdan,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Taipei: The far East Book Co., Ltd. 2000).

③ 许渊冲、陆佩弦、吴钧陶《唐诗三百首新译》,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87年版。

④ Peter Harris,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 按:哈里斯在其译本正文后注释部分提到《唐诗三百首》的版本众多,在众多版本的编者中,他最需要感谢的是金性尧和赵昌平,由此推断哈里斯译本所用底本为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该版本以1885年四藤唢社所出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为底本,共八卷,收录唐诗313首。

⑤ Geoffrey Waters, Michael Farman, and David Lunde,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New York: White Pine Press, 2011).

⑥ Betty Tse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320 Tang Poems*, 2011, <https://ia803002.us.archive.org/3/items/54769765englishtranslationof320tangpoemsby28utsc20110506edition/54769765-English-Translation-of-320-Tang-Poems-by-28utsc-20110506-Edition.pdf>. 按照邱燮友在《新译唐诗三百首》前言中所说,邱译本是以1834年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为底本,共选诗320首。因此,也可以说沃特斯、法曼和伦德译《唐诗三百首》和曾培慈(Betty Tseng)译《英译唐诗三百首》均是以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为底本。

《唐诗三百首补注》四藤陞社版、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和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其中以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餐花阁版收诗数量最少,为 310 首。为了便于统计,本文以该选本为基础,考证了其他三个版本中诗作的增补删减情况并统计如下(见表 1):

表 1 《唐诗三百首》三种选本增补删减诗作情况统计表

编者	选本名	增补诗作总数	增补诗作	删减诗作
陈婉俊	《唐诗三百首补注》 四藤陞社版	3	杜甫《咏怀古迹》之一、二和四	无
喻守真	《唐诗三百首详析》	8	张九龄《感遇》二首(“孤鸿海上来”、“幽人归独卧”),李白《长干行》一首(“忆妾深闺里”)、《子夜歌》三首(“秦地罗敷女”、“镜湖三百里”、“明朝驿使发”)、《行路难》二首(“大道如青天”、“有耳莫洗颖川水”)	元稹 《行官》
章燮	《唐诗三百首注疏》	11	杜甫《咏怀古迹》一、二和四,张九龄《感遇》二首(“孤鸿海上来”、“幽人归独卧”),李白《长干行》一首(“忆妾深闺里”)、《子夜吴歌》三首(“秦地罗敷女”、“镜湖三百里”、“明朝驿使发”)、《行路难》二首(“大道如青天”、“有耳莫洗颖川水”)	无

《群玉山头》作为“《唐诗三百首》第一个英语全译本”,不仅仅“在文学翻译史上有其重要地位”^①,还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自 1929 年首次出版后再版十余次,成功进入了英语文学体系,入选各种诗歌选集与大学文学教材,被誉为“本世纪最优秀的美国诗歌之一”^②,不但“对美国诗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些译文本本身已成为美国诗歌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③,在新世纪更是成为当今《唐诗三百首》电子文库的英文母本^④,英语世界一代代的读者正是通过这个选本认识和欣赏《唐诗三百首》^⑤以及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根据“经典化”的定义,即“文学作品经读者的反复阅读,批评家和专家的长期研究,最终被接受并确认为具有天才性和独创性的经典作品这一过程和方式。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一些常见标志是进入权威性文学作品选集和工具书,进入大学课堂,成为经常被引用的经典篇章”^⑥。《群玉山头》已经成为了英语世界的经典译本。

下文将通过对比译者背景及翻译目的、译文诗作编排、译本副文本研究,以及对《唐诗三百首》六个英文全译本的语言分析,来分析《群玉山头》经典化的成因,分析它为何能在众多译本中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译本。

二 江亢虎、宾纳与《群玉山头》

江亢虎(1883—1954),原名绍铨,生于江西仕宦之家,从小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曾是前清举人,深谙国学。江亢虎清末曾任编译局总办、《北洋官报》总纂、京师大学堂教习和法部员外郎等职。1901 年赴日本考察政治,1905 至 1910 年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史和日本史,并创办北京公共学堂,自任校长。1910 年春开始游历欧洲各国。1911 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后因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远走加拿大,

① 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8 页。

② Kenneth Rexroth, “The Poet as Translator,” in *The Craft and Context of Translation*, eds. W. Arrowsmith & R. Shattuck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4), 46.

③ 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中的中国文化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 页。

④ 《唐诗三百首》的电子版基于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唐诗三百首》中文电子版,共收录译文 320 首,新增 10 首,即张九龄《感遇其一》(第 001 首)、张九龄《感遇其三》(第 003 首)、李白《子夜四时歌·夏歌》(第 040 首)、李白《子夜四时歌·冬歌》(第 042 首)、李白《行路难之二》(第 083 首)、李白《行路难之三》(第 084 首)、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第 190 首)、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第 191 首)、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四》(第 193 首)。新增加的译文分别来自于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3 年出版的阿瑟·怀特(Arthur Wright)译《唐诗赏析》(*Perspective on the Tang*) (第 190 首、第 191 首、第 193 首)和香港商务印书馆 1987 年出版的许渊冲、陆佩弦、吴钧陶编译《唐诗三百首新译》(第 001 首、第 003 首、第 040 首、第 042 首、第 083 首、第 084 首)。电子版没有沿用《群玉山头》的编排方式,而是还原了蕲塘退士的编排,按照诗歌体裁分为 7 类,每首诗都是中英对照,正文部分没有注释,文末也没有专门的注释部分。

⑤ 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群玉山头》入选各种诗歌选集和大学文学教材上,还体现在频繁地被引用,本文涉及的另五个《唐诗三百首》的全译本的译者几乎都在译者序或参考书目中承认自己参考过《群玉山头》这个译本。

⑥ 朱微《中美诗缘》,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2 页。

后辗转美国,于1914年到1920年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中国语言文化,并结识了美国诗人宾纳,后来受聘主持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①。1922年,江亢虎返回南京教书,同年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并自任校长。1928年以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身份返美,两年后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中国研究系主任。^②江亢虎用中、日、英三门语言出版过不少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书籍,如英文版《英文讲义:中华文化叙论》(*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③,和宾纳合译的《群玉山头》这本译作是他在美国读者中接受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部作品。

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是美国著名现代诗人、翻译家、学者,汉语名字陶友白。宾纳1881年出生在美国纽约,190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青年时期即投身文学创作。在哈佛就读期间,与阿瑟·费克(Arthur Davison Ficke)成为好友,表现出对东方文化浓厚的兴趣。1917年,两人共赴日本,成为当时美国和日本诗歌艺术交流的先驱。1918年宾纳返回美国,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诗歌赏析和诗歌创作(2003年10月伯克利市修建了一条诗歌大道,其中就有宾纳译李白《月下独酌》)。1919年离开伯克利分校后,宾纳积极帮助青年一代的诗人研习中国古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有著名的美国后现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思洛斯(Kenneth Rexroth)^④。1972年宾纳逝世四周年,“维特·宾纳诗歌基金会”(Witter Bynner Foundation of Poetry)成立,资助美国的诗歌创作与翻译活动。^⑤

宾纳学识渊博,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曾于1920年与费克一起到中国旅游,并由江亢虎介绍,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并作长谈。这次中国之旅对他的诗歌创作和唐诗英译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此以外,他还和中国学者许地山通信,请教一些中国特有的花草虫鱼的拉丁学名和英文译法^⑥。江亢虎和他译介的《群玉山头》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新诗的产生与发展,并深深地影响了他自身的诗歌创作。

宾纳在与江亢虎合作翻译《唐诗三百首》之前,曾经在1920年与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合译过《诗经》中的6首诗,收录在他的诗集《潘神之曲》(*A Canticle of Pan*,1920)中。宾纳认为中国诗歌的巅峰时代在唐代,在江亢虎的提议下,决定合译《唐诗三百首》。江亢虎深知,《唐诗三百首》在中国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蒙学必读书,能将这部唐诗经典选本翻译到美国,本身即是不小的贡献。其次,宾纳认为唐诗中遍布着“不受教条束缚,不被律令禁锢,不为权威震慑”^⑦的自由精神,这与当时西方的不堪重负、纷争不断的生活恰恰相反,“这些诗歌(唐诗)使人找到了内心的平和和人类的美好愿望”^⑧，“我希望把中国诗译成人性的语言,这样西方人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要是他们注意到我的努力,他们会看到中国人简朴的人性,也看到我们精神中虽然有那么多恶毒的东西,也有与人类相同之处”^⑨。宾纳不仅希望将《唐诗三百首》译介给美国诗人们,作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来源,也希望能为美国普通民众提供一个精神上的桃花源。

1929年正式出版的《群玉山头》共译介唐诗310首。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版本繁多,最早的应为咸丰六年(1856)餐花阁本八卷,共收录唐诗310首。但该版本在光绪年间已不多见。现在最常见的是光绪十一年(1885)四藤唢社重刻本,此版本亦为八卷,但选诗数量较餐花阁本多出3首,共313首,多出的分别是杜甫《咏怀古迹》之一、二和四。译本封面有江亢虎用中文题写的书名——“群玉山头”,取自李白《清平调》中“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译本以李商隐“盖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随我之所触而发宣之”为题句,

①朱徽《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②以上江亢虎生平信息,除特别标注外,均参见:李珊《江亢虎北美传播中国文化述论》,《史林》2011年第2期。

③江亢虎《英文讲义:中国文化叙论》(*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中华书局1935年版。

④这位后来毕生追随中国“诗圣”杜甫召唤的美国后现代诗人、翻译家,正是在宾纳的引导下开始学习中国古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

⑤以上宾纳生平信息,除特别标注外,均参见:朱徽《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第81—82页。

⑥HSÜ Ti-shan to Witter Bynner, Jan. 14, Year missing, *Witter Bynner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转引自: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⑦James Kraft, “The Poetry of Reality: Witter Bynner’s Prose Pieces,” in *The Works of Witter Bynner: Prose Pieces*, ed. James Kraf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78), xxi.

⑧James Kraft, “The Poetry of Reality: Witter Bynner’s Prose Pieces,” xxi.

⑨Witter Bynner to Carl Sandburg, (circa 1918), *Witter Bynner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转引自: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第207页。

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两篇译者序,宾纳的序题为《诗歌与文化》(“Poetry and Culture”),作于圣达菲;江亢虎的序题为《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作于北京。第二部分是译诗正文,译文按照原作者姓名拼写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第三部分是附录,包括到唐朝为止的中国历代起止时间、唐朝各代帝王在位的起止时间、诗人中文姓名、重要年代、地名解说、有关诗歌创作背景、典故的注释,以及宾纳所做“致谢”。

宾纳在正文后的致辞部分提到该译本古体诗的上卷部分主要由江亢虎翻译完成,但是自1921年江亢虎返回中国后,两人的合作主要依赖书信往来。囿于当时中国时局动荡,跨国通讯不便,沟通交流不太顺畅,因此,译文中有一些明显的误解和误译,如将《陇西行》与《马嵬坡》的作者陈陶与郑畋互换、将崔颢误作了崔灏、将裴迪误作斐迪等常识性错误。但是,这些疏漏瑕疵并未实质性影响这部译作在当时美国读者群中的受欢迎程度。在《群玉山头》单行本成书之前,其中278首唐诗的英译文已经发表在48种杂志上。《群玉山头》在1929年初版之后数次再版,现在市面上还能购买到1931年版、1939年版、1945年版、1951年版、1960年版、1964年版、1969年版、1972年版、1987年版,如此密集地再版是该译本在英语世界广受欢迎的最好例证。另外,《群玉山头》已经成为当今《唐诗三百首》电子文库的英文母本,在英语世界各大高校电子图书馆中保存,证明了它在英语世界的权威影响力。

三 宾纳、江亢虎《群玉山头》合译本经典化成因分析

从译者的先见(pre-seeing)来看,宾纳是因为江亢虎的提议才选择了《唐诗三百首》,其时他最想翻译的是王维的诗歌。因此,宾纳本人对《唐诗三百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或钻研,比不过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的韩登或拥有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学位的沃特斯。从译者的语言能力来看,宾纳不懂中文,是靠江亢虎对中文进行解释之后再翻译,这一点无法与同是母语译者的韩登或沃特斯相比。韩登长期与中国学者交好,并曾在武汉大学学习;沃特斯更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博士,并因为工作关系长期旅居香港,不仅普通话流利,还熟悉广东话。从译诗的忠实度来看,比不过许译、沃译和曾译。许译忠实的是原诗意、音、形三个层面,沃译与曾译则是尽可能地将原诗的内涵与外延都写在译文中,生怕遗漏。宾译只翻译原诗最基本的意义,通常是字面翻译,对于音韵的传达则比较随意,没有刻意追求。

然而,《群玉山头》的影响力远超后世出现的五个全译本。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在英语世界将《群玉山头》作为《唐诗三百首》的英文母本并将其电子化存储于各大高校电子图书馆之时,韩译与许译已经出版了数年。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宾纳与江亢虎的翻译目的非常明确,是为了译给读者看,而不是为了贯彻自身的翻译主张或表达自身对于原文本的挚爱。因此,《群玉山头》中没有过度翻译的现象。

其次,从译本的编排方式来看,《群玉山头》采用了英语世界读者习惯的方式。从整个译文主体部分来看,《群玉山头》比其他译本更接近英诗,异质的中国文化成分主要存在于词汇层面,这种不远不近、不多不少的陌生化使得读者的阅读成见与宾译刚好在适合的范围之内,不会因为太远而将读者推开,也不会因为太近而无法激发读者的审美愉悦。

再次,《群玉山头》的副文本因素也功不可没。副文本因素包括译者序和附录。译文正文中没有传达出来的唐诗的特点在两位译者的译者序中得到了体现。宾纳在序言《诗歌与文化》(“Poetry and Culture”)中展现了一位不懂中文的英文译者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知识。他在序言中首先表示遗憾,在求学时期对文化的研究只限于希腊的大师和希伯来的先知,而在后来机缘巧合遇见中国古典诗歌之后,他发现比之前两者,中国古典诗歌给他的教育更新、更好、更深。接下来宾纳向读者客观地描述了诗歌在中华民国之前的社会生活中的普及,人人皆是诗人,人人皆是诗人最好的听众,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皆可入诗,人人皆能领会美妙的自然世界与美好的语汇组合之间的亲密关系。宾纳将民国之前的中国历代诗歌的普及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相比,让英语世界的读者能了解古典诗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 and 功用。宾纳的序言中准确描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少年情怀,阐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音乐性。宾纳还在序言中将英语世界读者所熟知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引入,说华兹华斯的田园诗与中国古典诗歌最接近,然而在与自然的亲近和谐方面还是不及中国诗人。中国诗人将真实、美好、永恒用一种简朴、自然、寻常而直观的方式表达出来。

宾纳的序言中直接与《唐诗三百首》具体的诗作相关的只占了小部分,绝大部分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普及型介绍。这样的介绍昭示了宾纳译本的目的: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打开通向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门,让西方的诗人看到灿烂的中国古典诗歌并从中汲取营养。由此推断,宾纳在翻译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界定在一种初级阶段的普及性读物上,他的目标读者是西方的诗人,因此,译本中的语言多半是异化的西方诗歌语言。

江亢虎的序言题为《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其中用了较大篇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从远古开始,到先秦的《诗经》,然后从汉代到唐代,以及唐代之后的发展史进行了回顾。序言从第六部分开始对《全唐诗》和《唐诗三百首》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对比,接下来则全部集中在孙洙《唐诗三百首》的介绍中,包括对孙洙为《唐诗三百首》所作的序、《唐诗三百首》中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区别、近体诗中六种诗歌体裁分类;第七部分按照诗歌体裁分别举例介绍格律音韵规则;第八部分则对中国“诗”的概念与西方 poetry 的概念的宽窄进行了厘清,解释了中国还有一部分包含在西方 poetry 概念中,但是在中国“诗”之外的韵文形式,如楚辞、词等。

宾纳和江亢虎的序言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偏重于向读者普及中国古典诗歌的基础概念,而非孙洙编纂的《唐诗三百首》。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人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介中国古典诗歌。秉承这种翻译目的,两人合作的译文也肩负着唤醒英语世界诗人以及其他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打开中国古典诗歌通向英语世界大门的任务。从该书问世至今近一个世纪的反响来看,宾纳和江亢虎完美地完成了他们的既定目标。

《群玉山头》的附录包括五个部分:朝代更替表、诗人重要年代表、地名表、译文注释和致谢。朝代更替表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起止时间表,非常简要,只列出各朝代及起止时间,旨在提供给读者一个大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时间背景作为参考。第二种则是唐代历代皇帝的在位起止年代,还包括对应的年号。这部分非常详尽,读者在阅读译文中遇到有关年号或时代之处,可以查阅这个部分,能很快找到对应的年代。这也便于读者自行查阅更多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了历史创作背景,读者要理解原文的意义就更容易。第二部分是诗人重要年代表。此表分为三栏,左边一栏是译文中出现的原诗人英译名,中间一栏是原诗人的中文名,中文名用繁体字书写,并且是名在前姓在后。右边一栏则是诗人的重要年代,有的是诗人在科举考试中上榜的年代,有的是诗人的生卒年代,对于生卒年代不详的则标注一个大概的时期。这一部分相对简略,没有对诗人详细的介绍,只有其生活或为官的年代。第三部分是地名对照表。宾纳和江亢虎两位译者用学者的态度严谨地对待地名的古今转换,逐一匹配唐诗中提及的地名与这些地名在当今对应的地名,目的是为了便于学者的考证。第四部分是译文注释。这部分主要处理原诗中出现的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比如典故、人名、意象、宗教等。这部分的工作其实最为繁杂也最能体现译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首先,要能在原诗中辨识出这些富含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存在,接下来才是如何用英文表达出来。在江亢虎的帮助下,《群玉山头》完成得非常出色。这部分也体现出译者良好的学术素养以及该译本的学术价值。这部分有三分之二的的内容用来一一列举《群玉山头》中的译文曾经以单首译文的方式发表过的刊物名。这也是宾纳的学者身份的体现,对于译文是否首发说明得非常清楚。

最后,为了更科学、更全面地了解六个译本的语言特征,笔者通过自建一对六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借助语料库分析软件,对六个平行译本的词汇和句法进行了分析,发现《群玉山头》用词简练,信息量较小,阅读难度低,在译文中大量使用缩写以重现原本的诗行简短的特征。另外,《群玉山头》倾向对名词和动词进行修饰描写,译文中有大量的形容词和副词,超比例的修饰词使得《群玉山头》词汇美感稍胜其他译本。从句子形态来看,《群玉山头》在六个译本中最接近《唐诗三百首》原本本。

总的来说,宾纳与江亢虎在翻译合作中对于《唐诗三百首》始终抱有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其目的也非常清晰,就是将这本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诗歌选集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他们的译介必然是普及性的,面对的必然是普通读者而非专业读者。因此,无论从译文本身、译文的编排还是副文本中对于文化语境的建设,都是一种简明扼要的普及性介绍。它点燃了英美学者学习、翻译、研究唐诗乃至中国文学的热情:“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多年以前,我读到了宾纳的《唐诗三百首》译本《群玉山头》,虽然译文中偶有瑕疵,但这个译本点燃

了我对中国文学的热情,鼓励我终身追求中国文学。”^①

即便面对专业读者,这个译本亦经得起检验。美国著名唐诗翻译家华兹生(Burton Waston)称赞宾纳和江亢虎的合作努力,指出在诗歌翻译中,“两人的合作产生了精彩的译文,还有数不清的令人惊奇的诗篇,让人能够像阅读原文那样获得完美的感受。尽管今天的学者发现它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都承认它也许是目前最好的英文翻译了”^②。

正如华兹生为1978年再版的《群玉山头》所作的序中总结的那样,翻译中国的诗歌典籍,传达原文的意思固然重要,译文读起来自然、地道也同样重要;在中国古诗的英译中,译者不能使用传统英诗的音韵、格律和词汇,而应当用一种比较自由的形式,展现中文原诗所蕴含的能量。宾纳和江亢虎的合译就成功做到了上述几点。简言之,宾纳与江亢虎合译的《群玉山头》是一个普及型译本,兼具学术性。归功于译者的客观冷静和清晰的翻译目的,整个译本以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为出发点,高度简洁,无重大疏漏,因而在众多译本中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译本。

四 结语

文化“走出去”是当今中国对外文化自信的体现,翻译则是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中国的文学文化典籍应该交给谁来翻译,是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诗学规范的中国译者,是熟知西方读者阅读习惯和西方审美的英美译者,还是应该借鉴宾纳与江亢虎的成功案例,交由中西译者合作完成?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定论。西方译界普遍比较赞同是由外语译入母语的“顺译”或者母语译者同外语译者合作的“合作翻译”,不太支持由母语译成外语的“逆译”。《唐诗三百首》六个英文全译本的译者身份刚好涵盖了以上所有类别,既有以目的语为母语译者的顺译(韩登、哈里斯、沃特斯),也有以原语为母语译者的逆译(许渊冲等39位译者、曾培慈),还有母语译者同外语译者合作的“合作翻译”(宾纳与江亢虎)。笔者发现在同一母语的译者之间,文本的相似度较高,而在不同母语的译者之间,文本的相似度则较低。许译本与曾译本,虽然译者的身份不同,前者是39位译者合作完成,其中多有鼎鼎大名的英语专家与翻译家,如黄新渠、胡壮麟、金隄、陆佩弦、许渊冲、杨周翰、袁可嘉、张谷若、张隆溪等。曾培慈的英文与翻译造诣暂时还不能与上述诸位相提并论。但是,即便曾与许译本的上述译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的差距,许译与曾译之间的相似度也远远大过这两个译本与其他四个译本的相似度。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典籍的翻译不能仅仅交给单一类别的译者完成,不论是母语译者、非母语译者还是母语与非母语译者的合作,不管是顺译、逆译还是合作翻译。译本间的差异对于原本来说并不是坏事,反而丰富了原本的意义,使原本在异域的生命力更加旺盛。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典籍需要这样的多样性、差异化的译本,来满足英语世界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我们需要鼓励、培养更多的译者参与到中国典籍的外译中去,同时鼓励多介质传播。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纸媒开始接受电子媒体的挑战。从传统的纸媒,到后来的电子媒体,到现在的网络媒体,《唐诗三百首》的英译本也开始以电子版本甚至是每年一修订的电子译本的形式出现,其影响范围从开始的英美大学电子图书馆扩展到后来的全球互联网范围。电子译本的出现,方便了各类、各地、各年龄层次的读者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阅读唐诗,大大推进了以《唐诗三百首》为代表的唐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责任编辑:唐 普]

^①Paul W. Kroll, "Reflections on recent antholog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no. 3 (August, 2002): 988.

^②Burton Waston, "Introduction to the *Jade Mountain*," in *The Works of Witter Bynne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ed. James Kraf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78), 23.